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赵逵夫 / 主编

秦史求知录

(上)

祝中熹 / 著

秦人自西戎、西周王朝与秦人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政治宗盟关系，秦人学习、吸收周礼文化，同时利用西周王朝日渐衰落的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力日强，在平定东夷之后，很快便承袭周人在西部的控制了对西北地区、美里、白吕与列强角逐中腹的霸权。



秦人自西戎、西周王朝与秦人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政治宗盟关系，秦人学习、吸收周礼文化，同时利用西周王朝日渐衰落的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力日强，在平定东夷之后，很快便承袭周人在西部的控制了对西北地区、美里、白吕与列强角逐中腹的霸权。

秦人自西戎、西周王朝与秦人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政治宗盟关系，秦人学习、吸收周礼文化，同时利用西周王朝日渐衰落的趋势，迅速发展，壮大，国力日强，在平定东夷之后，很快便承袭周人在西部的控制了对西北地区、美里、白吕与列强角逐中腹的霸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青院 11 000677285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赵逵夫 / 主编

秦史求知录

(上)

祝中熹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史求知录/祝中熹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赵逵夫主编)

ISBN 978-7-5325-6618-1

I. ①秦… II. ①祝…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
IV. ①K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8646号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秦史求知录

(全二册)

祝中熹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40 插页 4 字数 580,000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6618-1

K·1628 定价:9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条件下,应该对先秦文学与文化进行集中的、系统的、更深入的研究。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般说来,距当今社会越近者,与当今社会的共同性越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便越大,借鉴意义也越大。但是,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它对后代在文学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此后任何一个时代不能与之相比。

在学术领域的情形是,从古到今,有关这一段的研究最多(包括经学范围内的论著),但近代以来学者同古代人们的看法之差距却最大,而且近代以来学者之间争论亦最多,分歧也最大。读读《古史辨》以来的有关论著,便可以明白。至于文学史著作,先秦一段似乎只是同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并列的一个时段,同各朝分体论述的情形一样,大多分为《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四大部分,有的在前面加上“概述”或“原始歌谣与神话”,后面带上“秦代文学”。而事实上,就中国文明史言之,秦以前的一段同汉以后一段时间大体相等^①。先秦时代没有摄影、录音、录像设备,我们对先秦时两千年社会的认识,除了有关史书、诸子著作之外,一靠地下出土的材料,二靠当时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当时人们心灵的反映。一部文学史,便是一部心灵史。至今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观念,认为先秦时代没有纯文学。《诗经》

^① 秦朝从统一全国至灭亡,前后十六年,秦统一之前同之后的历史,无论人物、文件都很难截然分开,故虽然严格的“先秦”指秦统一六国以前的两千多年,但很多学术著作将秦代也附于战国之后。研究政治思想史者,则多将“秦汉”连接论述之。大体上根据研究的内容,各取其便。

中的三百多首诗难道不是纯文学？世界各个民族中，文学不同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一般说来，诗歌都是产生最早的。我国西周末年宣王时代即产生了以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为代表的中兴诗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群体，这也是很多学者未能想到的^①。

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必须对先秦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各方面有一个科学、明晰的认识，既消除种种盲目信古的谬说，也克服一味疑古的心理与思想，从而对它们作科学的、更为细致的研究。

百年来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及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已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使是“疑古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也对我们彻底地清理理论场地、对不少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抛开各种旧说的束缚而从头做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字资料，更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前人无法弄清的问题，纠正前人的某些错误，解决一些历史的悬案，补出某些历史的缺环。

我们的先民大约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在距今六七千年的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铜片）。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出现中心聚落，表现出明显的阶段、阶层的差异，有的大墓葬中还有象征着权威、武力、生杀大权的玉钺。到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更为明显。如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原始殿堂^②。可见，当时已确立了强制性权力系统。而阶段或阶层的存在，强制性权力系统的确立，是国家形成的标志^③。炎帝族、黄帝族争战于阪泉，黄帝族、蚩尤族争战于涿鹿，以及颛顼、共工之战，实际上就反映了在一定王权之下，各部族间为扩大势力、争得更多生活、生产资源而进行的战争。当时的帝（部族集团的首领）或由各部族首领协商确定，或由上一任的部族集团首领提名确定。与由选举产生的制度相比，逐渐带有强制确定的性质，已为以后的世袭王权奠定了基础。《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

① 参拙文《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5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学术界普遍以“屈宋”为最早的作家群体，其实屈原、宋玉并不完全同时。

②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第 197 页。

③ 同上，第 7 页。

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和《吕氏春秋·行论》有类似的记载^①。《韩非子》中言鲧因反对传于舜，尧“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并说时舜为“匹夫”，说明舜此前在部落集团中并无高的地位。尧为什么不顾其他首领的反对而一意传位于一个并无地位的人呢？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继位者完全听他的话，维护他的利益，包括他的声誉。而《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竹书》，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或者是尧初言传于舜只是一个姿态，本意是要传于儿子丹朱，后来舜在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强取之；或者尧虽打算百年之后传于舜，舜等不及，因而抢班夺权。总之，“尧舜禅让”乃是儒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改造了的历史，其实当时已开始了家天下的前奏。禹的宣言传位于益，而实欲传于子，表现得更为明显。《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一个部落的首领或曰酋长因朝会迟到而被杀，帝（君主）的地位如此之威严，其法令如此之峻急，则其个人与家族的势力到了怎样的程度，便可想而知。古代文献中说禹年老之后在部落集团会议上提出继承人的问题，大家推举皋陶，但皋陶早死。后又推举了益。其实这时推举帝的继承人在禹来说，只是因袭旧制度与习俗进行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他将天下传于自己儿子启已经是水到渠成，只需交接的过程了。《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淮南子·齐俗》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启亡之”言启灭了有扈氏。）《尚书·虞夏书》中有《甘誓》，即记启灭有扈氏之事。

扫除儒家所散迷雾，由古代文献即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从炎黄时代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而近几十年地下挖掘的资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对“轴心时期”我国文化的繁荣及各种思想的来源、形成与发展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而举兵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无力治理河道,洪水暴发会淹没平原地带居民的房屋等生活资源,故先民多居于丘陵地带。西北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远祖生存栖息地之一。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洪水的发作、消退,果实谷物的生长、成熟等)的逐渐掌握,防止河患能力的增强(局部的围堵、疏通等),人类慢慢向平原地带发展。古代传说伏羲“生于仇夷,长于起城”,“徙治陈仓”(《路史》。其说本荣氏《遁甲开山图》,见《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正说明了远古氏族生存、迁徙的一般状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7 800年,已发现绳纹,则作为八卦前身的结绳记事,具有了产生的基础。那么,作为远古时先民记数、记事、判断吉凶的“八索”,也应该已经形成。这就是八卦的前身^①。周人使用八进位制,这就同“八索”有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用十进位制,因为人的两手共十个指头,是人类最早的、与生俱来的计算工具;有的民族用十二进位,因为一年十二个月,这种进制起源于对一年十二个月事件的记载。周人最早用八进位制,涉及度、量、衡、历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文献中有大量证据,只是学者们熟视无睹懵然不知而已。如:

“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考工记·庐人》郑玄注,《左传》成公十二年杜预注)，“八寸曰咫”(《国语·鲁语下》韦昭注)。《说文》：“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明言“咫”为周尺，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也是周人度制。

《国语·周语中》韦昭注：“十六斗曰庾。”又出土战国金文中有“𠄎”字，学者们多释为“半”，实误。此乃是半庾之义，即八斗，为周人衡制之单位。八斗曰𠄎，倍八曰庾，略同于长度单位之“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又据《仪礼·丧服》注，二十四镒为一升。二十四也是八的倍数。则八进位制在量制中也自成系统。

《汉书·律历志上》：“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又据《孟子·公孙丑下》：“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言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索”即绳索之“索”。“八索”为远古时记数、记事之工具，后也因奇偶之数以示吉凶。为八卦的前身。参拙文《八进位制子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刊《伏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

周人的八进位制在历算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湖北云梦出土秦简《日书》中的《日夕表》，便是将一天分为十六等分。一年中日、夕的变化，从“日六夕十”到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五夕十一”，再恢复到“日六夕十”，按月变化，直至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日十一夕五”，再又一月月向日短夜长变化。秦人发祥于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之地，周人最早发祥于陇东马莲河流域^①。后来周人东迁，秦人有周岐以西之地，“收周余民而有之”（《史记·周本纪》），形成周秦文化的交融，则秦人在某些方面也采用了周人八进位制。

“八节二十四气”民间至今十分重视^②，十六两为一斤，这种衡制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半斤八两”这句俗语至今活在语言中。则可见周人八进位制影响之深远。“八卦”的变化规则、卦爻辞及对这些进行解说的《易传》，组成《周易》。不仅八卦，整个《周易》的理论框架也同周人的八进位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八八六十四，为重卦，在远古周人应是整数。《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是《周易》哲学体系中有关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周易》的很多理论基于此。

“八卦”固然是用来占卜的，但它起于记事，而且影响了我国上古时代的度、量、衡、历算等同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密不可分的各个方面，又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充满了辩证思想的阴阳学说虽然其产生同我国先民从远古即主要以农业生产（由采集农业到种植农业）有关，但其系统化为一种思想方法，也应同起于“八索”的“八卦”从一开始即以奇偶示吉凶有关。中华民族美学思想中的“对称美”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也无不与《周易》及其前身有关。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当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已发现刻画符号，这既是文字的滥觞，也是后代八卦形成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八卦卦画，是产生较迟的。由八索到今日之卦画之间，是数字卦，作

① 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486~487页。

② 《周髀算经》下二：“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注：“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二十四气”即二十四节气，农历中是物候变化的重要坐标。

连山形,用“一”、“五”、“六”、“七”、“八”这五个数字组成。为什么没有“二”、“三”、“四”?因为这几个数在上古分别用两个、三个、四个“一”重叠来表示。恐相互间不易识别,故奇数有三个,而偶数只有两个。当时五作“×”,六作“∧”,七作“十”,八作“八”,竖写如连山形。这其实就是古代文献中说的“连山易”。至今有不少学者对八卦的形成,八种卦画的来源以及“连山易”作出种种完全出于猜想的解释,其实都是向壁之说。

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之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学者们多能上溯至先秦时《易》、《书》、《诗》、《礼》、《春秋》,而能更上求其形成之基础与根源者并不多。研究儒家上至孔子为止,研究道家上至老子为止,研究墨家上至墨子而止,研究兵家上至孙武为止。其实,这些学术祖师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老子上承容成,孔丘上承周公旦(当今学者多改为“姬旦”,误。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秦始皇亦当称“赵政”,而不当称“嬴政”,新出土文献已证明之)。这样看来似乎中国文化发轫于春秋时期,此前似乎是一片空白。这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适应的。近若干年中,李学勤等先生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的研究,张光直、余英时、陈来等对“前轴心时代”的探讨,使人们对我国春秋中期以前的历史有了较明晰的认识,在《周易》、《尚书》、《诗经》及《逸周书》、《国语》、《左氏春秋》、《楚辞》、三《礼》等文化元典的研究方面,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先秦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以至科技史、逻辑学等,一百多年来产生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具有创见的论著。总的说来,成绩是巨大的。但应该重新研究、重新审视的问题尚多。在上下贯通、溯源辨流、打破旧有的藩篱、更准确地恢复历史真相方面,还有些工作可做;在消除经学、旧史学的束缚,同时又打通学科的界线,对先秦一些文学、文化现象作新的审视方面,也有些工作可做。因此,我们准备出一套《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如前所言,甘肃是伏羲氏发祥地。伏羲氏是远古一个氏族,有氏族就有氏族首领,所以在长久的传说中伏羲是指一个具体的人。关于这个氏族的延续迁徙情况,我们先不说,但文献中说的伏羲时代,确实代表了我国史前社会种植农业繁荣以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一

一个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天水西山坪一期文化、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包括天水师赵村、秦安王家阴洼、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在内的不少文化遗址中,保存着丰富的仰韶早、中、晚各期文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的马家窑文化(年代为公元前 3300 ~ 前 2050 年),以及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大体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齐家文化,为弄清中华民族早期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庆阳县董志塬、韩滩庙嘴等处的商代遗存,陇东灵台、泾川、崇信、合水、正宁、宁、庆阳等县,及天水、陇南一些县的大量西周文化遗址,以及布于甘肃很多地方的春秋战国文化遗址,如辛店文化(因 1924 年在临洮县辛店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寺洼文化(因 1923 年在临洮县寺洼山首先发现而得名)、沙井文化(因 1924 年在民勤县沙井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四坝文化(因 1948 年在山丹县四坝首先发现而得名)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民族交融过程。尤其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秦早期先公先王及贵族墓葬群,使我们对秦国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周人、秦人都发祥于甘肃,都先后达到不同程度的统一局面,从而形成周王朝与秦王朝。周代的礼制、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秦王朝通过实行郡县制及“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其政体亦影响以后两千余年。而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最久、流传时间最长、传播最广的牛郎织女传说,并形成一个“七夕”节^①。这都是以前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

近几年来在甘肃和全国很多地方出土大量刻画符号、陶文、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不只是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历史疑案,使我们在有关先秦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所持的观念大大转变。在今天新的条件下,以一种新的观念来解读先秦时文学、文献,可能会发现以往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经我省领导关心,于 2008 年在

^① 参拙文《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人文杂志》2009 年第 1 期;《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大学报》2005 年第 6 期。

原西北师范大学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由省内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而仍附设于西北师范大学。本省和学校领导对中心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共同努力,在这一套丛书中推出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以与学界朋友共商。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批评与帮助。

2010年2月22日

序

赵逵夫

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况曾去齐至秦，见到秦昭王与秦相范雎^①。《荀子·强国》中载应侯范雎问荀况：“入秦何见？”荀况回答说：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通“佻”。言不为奇异之服），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音“苦”，滥恶也），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清闲，因其百事随时处理，不积压），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侥幸）也，数（必然的道理）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为便阅读，摘王先谦·卢文弨等人注于相关文句之后）。

这是荀况述亲眼所见当时秦国政治、社会、吏治、民风方面的情况，及他的评价。荀况是战国末年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既继承了儒家以礼义治国的思想，又具法家思想，又兼采道、名、墨诸家之说，从认识社会的眼光和理论水平来说，在当时无以过之。荀况对当时秦国社会的看法，同后代很多史书中的评价不同。古今的很多著作说到秦多称之为

^① 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荀卿赴秦见昭王应侯考》，荀况之去齐至秦在齐王建元年（前264）。

“暴秦”，只看到它在统一六国之中的刀光剑影及六国志士反抗中的悲剧。屈原的事迹和他的《离骚》等作品是十分感人的，而楚国朝廷中亲秦的郑袖、靳尚、上官大夫，以及代表秦国几次到楚国玩弄挑拨离间之计的张仪也是为人所痛恨的。从人的品德及社会公德方面说，应该这样看：郑袖、靳尚、上官大夫作为楚国人而为个人或家族的利益不顾国家前途，应该受到谴责；屈原悲剧的造成也同张仪有关。从屈原和楚国的立场来看，郑袖及张仪等都应受到谴责。屈原是主张由楚国来统一全国的。在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之后，人心希望统一。战国中期之后统一全国可能的只有三个国家：齐、秦、楚。因为这三国的背后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齐国东面是海，东南沿海而下可通吴越之地，唯远而难以制约。秦国以西有很宽广的地域，分布着数十个小部族。楚国以南发展的余地也不比秦小。拥有广阔的国土，就有了统一全国的物力、人力上的准备。相较而言，秦国、楚国的条件最好。很多学者论述当时形势都引述“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这两句话，却不知其根本上的原因。秦楚两国都希望由自己统一全国，秦在商鞅变法之后发展迅速，又用“连横”之策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楚国要同齐国等山东五国联合以遏制秦国的向东发展。屈原主张对外联齐抗秦，秦国自然要设法打破山东六国的联盟，使楚国的计划落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说，秦国、楚国都有承担统一全国这个历史使命的资格和可能，只在于哪一个采用的方式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哪一个的可能更大而已。

说起这两点，屈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实行美政，先统一南方，待条件成熟，再统一北方。这自然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楚国的旧贵族不会轻易地让步，屈原的设想难以实现。秦国则以迅马利剑开路，将一些国家腐朽的贵族制度连同他们的国家一起灭掉了。但无论怎样，人们对仁政还是希望的，在广大人民群众对治理国家毫无发言权的封建社会中，仁政也成了人们永久的梦想。就像孔子一生主张仁政，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实行的国家，但人们仍以他为圣人加以膜拜一样，人们也永远思念、敬仰屈原，纪念这位为了美政、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诗人。

很多人对战国时秦国的看法同此有关。但这是两回事，应分开来

看。实质上,在战国时的政治改革中,最彻底的是秦国。商鞅虽然被迫害而死,但商鞅变法的成绩保留下来了,所以才会有《荀子·强国》中说的那种吏治状况与社会风气。至于楚国,随着吴起的被杀,旧制度全被恢复了。其后莫敖子华(沈尹章)、屈原都作过改革的设想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未能最后成功。为什么秦国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这同儒家思想在秦国的影响较小,“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法制状况有关。

从思想潮流来说,战国各国大体分三大片:三晋与齐鲁一带,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深,子夏又讲学于西河,儒学的承传不断,讲仁义,重礼乐。陈、楚及其以南重巫覡、好祭祀,道家思想为主。秦地民性质直,而高上气力,虽然儒、道思想均曾有所传播,但总体来说法家一套容易推行,墨家的影响也较儒、道为大。《汉书·地理志》中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之地,“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同时,由于人民以射猎为先,刚强勇武,也必须有严格的法纪管理才成。清末湖南学者孙楷,湘潭人,遍搜群籍,综核史册,著《秦会要》一书,其《序》论及秦法,言:

自汉以来,递相沿袭,群以为治天下之具,无外于此;即或更张,而其大者,卒无以相易。

“文革”中毛泽东有《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中云“百代都承秦政体”^①,或即本于此。只是,毛泽东未能注意到周文化从思想方面影响中国三千多年,从意识形态、思想基础方面统一了全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秦在统一全国之后能突破此前数千年氏族分封制的传统,抛弃周代数百年传统的宗法制而实行郡县制,是有很深的文化渊源的。所以,秦国政治体制之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应该认真研究。但秦国统一全国前的历史,秦早期的历史、嬴秦的来源,活动情况、文化传统等,也都应该认真研究。但事实上,自古至今,对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比起对三晋、齐鲁及楚文化的研究来薄弱得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关于秦的早期历史,过去学术界虽然也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大多很不一致。即如关于秦人族源,虽然《史记·秦本纪》中有些记载,但在战国秦汉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远古史中很多部族被简单地归到五帝之下,好像华夏各族全出于黄帝,如《史记·三代世表》所记那样,所以也引起学者们的怀疑。

王国维《秦都邑考》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湣者,已居西垂。”又说:“然则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相当: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得岐西地后之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王国维这篇文章虽未具体论证秦人之来源,但其论都邑所得结论坚实不可移易,由其都对都邑变化的方面看,自然会得出“起于戎狄”的结论。后来之学者如蒙文通等从王国维之说,又找出一些证据。从文献方面说,《史记·秦本纪》中载,申侯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湣。”中湣为嬴秦的正宗近祖。史所谓“邠山”即邠戎,则似中湣为戎人。《秦本纪》又明言中湣之父“胥轩戎”。《秦本纪》言“中湣在西戎,保西垂”,则从传世文献看秦人由西戎而来。而从文化遗存方面看,学者们认为嬴秦墓葬的洞室墓、屈肢葬式、葬品中多铲脚袋足鬲,皆与中原文化不同而多见于甘、青地区的羌戎文化。似由此也说明嬴秦来自西戎。

但也有学者主张秦人来自东夷。卫聚贤的《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以为穀、黄、梁、葛、徐、江、奄等嬴姓之国原蔓延于山东、江苏及河南、湖北,而秦亦嬴姓,故谓秦民族发原于山东,后至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东发展(《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黄文弼《秦为东方民族考》(刊《史学杂志》创刊号192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主此说。黄氏并举鲁有“秦”地,及《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前者名同于秦,后者与李斯所云“秦皇最贵”之说相合,为秦东来之证。徐先生在其书第二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之二《东夷集团》一节说:秦、赵“为殷末蜚廉的子孙西行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第五章之《东西方的两种五帝说》一节也说到这个意思。

但都是从华夏民族总的划分上笼统言之,未涉及对文献中一些具体论述的解释。此后学术界或主“西方戎狄说”,或主“东来说”,均有理由,难以遽定。

“文革”后林剑鸣先生有《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等。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也先后出版,两书均主“东来说”。段连勤有《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1982年《人文杂志·先秦史集刊》),后有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第4期),并重申东来说,对一些问题加以梳理,以期解决一些疑问。如以为嬴秦墓葬的三大特征是秦人征服西北戎族后戎族文化融入秦文化形成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今甘肃南部礼县大堡子山出土大量秦早期铜器等,发现了大型墓葬和车马坑,时间当西周晚期,于是,又引起关于秦人始源的讨论。虽然在一些看法上仍然不一致,但这是在新的材料基础上的探究。可以说,此前各说都包含有部分的真理,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些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更为明确,尽管结论完全不同,但都更接近于真理。先是王子今先生有《从玄鸟到凤凰——试探东夷族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1987年),后祝中熹先生发表《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1996年10月“学术专辑”),结合历史文献、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的大量文物及相关文物上的图案等,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接着,祝中熹先生的《秦人远祖考》、《秦人与西周王朝的关系》、《秦人早期都邑考》、《地域名“秦”说略》、《再论西垂地望》、《南岬北岬与西垂地望》、《大堡子山秦西陵墓主及其他》、《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等文,先后问世。

说来十分凑巧,祝中熹先生是山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而到了甘肃,曾长期在礼县工作,他的夫人便是距发现了秦先公陵墓的大堡子山不远的盐官镇人,祝先生90年代初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他对山东、甘肃有关文献和地理状况、民俗、文化的了解都极深,尤其对礼县一带大堡子山秦早期陵园、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器物及遗址

形制都了如指掌,对礼县、天水、甘谷、张川、清水一带有关遗址的情况及出土先秦器物也都了然于心。别的且不说,只这种人生经历,似乎便是“上天”专派他来揭早期秦史一系列谜底的。

祝中熹先生在专业上也十分痴心于历史文献的搜寻与研究,对前哲时贤之说极为重视。应该说,他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但当中不少具体问题的解决、一些细节的说明,仍反映出祝中熹先生对史实的深入了解及他个人独特的学术见解。在许多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今人不同的创见。比如,他也主嬴秦东来说,但他认为其由东至西的时间远在尧舜之时。《尚书·尧典》中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去东南西北方测定节气,而羲和部族是少昊与颛顼的后代,是属于崇奉阳鸟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郟子言,少昊氏的“凤鸟氏”即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启”指立春、立夏,“闭”指立秋、立冬。《大戴礼·五帝德》载孔子语,言高阳氏的功业,也说到“履时以象天”等作为。《尧典》所言“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祝先生认为这个“西”即指汉代之西县地,自远古即名西。祝先生从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历史地理等方面进行考证,可谓左右逢源,合若符契。

《史前研究》2000年辑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提出“‘秦’本是东方的地名,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所以得占周畿;赵的一系始终在今山西,所以得秉晋政”。顾先生以为《史记·秦本纪》所载“中湫在西戎,保西垂”的说法是秦人为掩盖从东方向西方被迫迁徙的讳饰,认为“非子住的‘犬丘’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城”。非子当西周晚期周孝王(前891~886年)时。此文写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发表在40年之后。顾先生是史学泰斗,又是在对整个西周以前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基础上提出,自然可以为东来说一方之中流砥柱。

但尽管这样,学界看法仍不能完全一致。因为“西戎说”与“东夷